

# 鸦片与清末西南社会

黎 虹

(四川师范大学草堂校区 贸经系, 四川 成都 610071)

**摘要:** 鸦片对近代中国危害极大, 其中又以云贵川受害最深。云贵川地区是近代中国鸦片种植最早最广、产量最多、泛滥最凶的地区。1906 年清政府重申禁烟, 云贵川三省相继采取了一些禁烟措施, 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关键词:** 清末; 鸦片; 西南地区

**中图分类号:** D691.9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15(2000)05-0106-07

鸦片, 这种“特殊商品”, 对近代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近代历史, 不仅以禁烟为开端, 鸦片问题还一直伴随中国近代社会的始终, 中国近代社会饱受鸦片之危害。要了解近代西南三省历史, 首先应该了解鸦片对近代西南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

## 一 清末西南地区鸦片的种植和泛滥

尽管早在唐代中国已有种植罂粟的记载, 但都是为了药用和观赏(罂粟花), 种植数量极少。真正大规模种植, 且将罂粟制成鸦片供吸食, 乃是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带来的恶果。

鸦片战争前后, 大批罂粟种子从印度、缅甸传入云南, 再传入贵州和四川。

云南是我国最早种植罂粟的地区。据于恩德考证: “道光初年, 滇省即有罂粟花熬为鸦片者, 而以沿边夷民私种最多, 内地人民亦复栽种渔利。……且当时滇省以地近边陲, 又多深山穷谷, 澈查不易, 致积习甚久。”[1](74 页) 道光三年(1832 年) 清政府颁布的禁烟上谕也说: “至滇省迤西迤东一

带, 将罂花熬成鸦片, 必须严为禁止。”[1](41 页)

贵州省种植罂粟, 最早大约在道光十一年(1831 年), 起初种在安顺、清镇、郎岱、普安、兴义等布依族、苗族聚居地区[2](35—36 页)。又据光绪三年郭嵩焘的奏疏记载: “至道光初, 其风始炽。浸寻由印度传至云南, 而南土兴矣; 辗转传至四川, 而有川土。”[3](卷十四, 12 页) 从云南、贵州种植罂粟时间来推断, 四川种植罂粟的时间大约在 1821—1831 年间。道光十一年(1831 年), 巴县档案记载, 四川省会理州、平武县、巴县、宜宾县等处拿获栽种罂粟花的五起案件[4]。这是有确切记载的四川最早种植罂粟时间, 而实际种植的时间可能还更早一些。

清末罂粟种植逐渐在全国传播开来, 而种植最广、鸦片产量最多的当属西南三省。

云南产烟之区, 除前面已经提到的迤东、迤西外, 迤南随后也开始种植, 罂粟种植已扩展到云南沿边所有少数民族地区。特别集中的是壮族、苗族聚居的安平厅(今文山), 几乎每家都种, 有的一

收稿日期: 2000-05-30

作者简介: 黎虹(1963—), 男, 四川成都人, 四川师范大学草堂校区贸经系讲师。

户一年要收一二千两鸦片,境内较大的场镇都是著名的鸦片市场[5]。

贵州的鸦片种植也像瘟疫一样从黔西很快传遍全省。据《宣宗实录》记载:道光十九年(1839年)，“黔省民、苗杂处，多有栽种罌粟熬膏售卖之事。外省奸商，每于栽种出土之初，亲来看估，预付银两，乡愚唯利是图”，郎岱、普定、清镇、贵筑各厅县先后查明，“民、苗私种者，或数亩、十亩不等”[6](卷三一八，19页)。据贵州《桐梓县志》载：“道光年间(1821—1850年)，邑中吸食者十数人，初闻(鸦片)购于兴义”，“咸同年间，洋烟弛禁后，种者吸者逐渐增多，光绪初年几乎无地不种，无人不吸”[7](卷九，2页，38页)。《贵州通志》也记述了光绪六年(1880年)、七年(1881年)以前贵州13府种植罌粟的情况：“上游(贵阳、安顺、兴义、大定、遵义)鸦片弥山满谷，下游思南、平越、松桃二府一厅与上游无异。此外镇远、思州、石阡、都匀四府，近来亦渐此风，习气尚浅。惟黎平一府悉是苗疆，栽种量最少”[8](卷四十一《前事志》，33—35页)。

四川鸦片泛滥的时间要比云南、贵州稍迟一些，但至迟在1861年之前川东地区已广泛种植罌粟了。据洋人布拉基司顿记述，1861年，“上溯扬子江时，已见其(指罌粟)为川省东部普通农作物”[9](46—47页)。又据《涪州志》载：“自同治初元，客粤者购罌粟籽种归，如其法试之，利数倍，于是争趋如鹜，不三年，罌粟遍野。”[10](卷十八《风土志》，7页)1869年，据上海总商会代表报告，“鸦片在四川物产中已占到最前列”[9](46—47页)。可见，当时四川已大量种植罌粟，种植最多的就是长江沿岸的涪州、丰都、巴县等地。

就鸦片的产量来看，据估计，1882年“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共出烟土二十六万五千担(每担大约100斤)”[11]，到1896年，四川年产烟已达12万担，云南8万担，贵州4万担，居全国各省的前三位[8](卷四十一《前事志》，24—25页)。当时云南所产烟土以质量最好而闻名全国，四川则以产烟最多而闻名全国。

就吸食烟土的人数看，云贵川三省吸烟人数最多。据行家估计，一位经常吸食鸦片者每年消费鸦片3斤，也有人估计6斤。如果按3斤推算，全国当时经常吸食鸦片者有21300832人，以6斤

推算则为10650416人，分别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5%或2.5%[12]。西南三省吸食鸦片的比例，则远远高于此。以四川为例，据宜昌海关不完全统计，1881年经宜昌转口四川的鸦片灯具就有20178套，1883年增至48625套[13](113页)。民国《三台县志》载：“三台县，嘉庆、道光之际，县人吸烟者少，而到咸同军兴后，吸者日众，始犹富者嗜之，既乃贫者恋之，不但男子困之，更有妇女染之。”[14](卷十二《食货志一·杂捐》，17—18页)重庆《广益丛报》报道：“四川鸦片之产额位全国之首，川省百四十余州县，除边厅数处，几无一地不植鸦片者，故吸烟者之数，远在云贵之上。”[15](1页)巴县档案记载更为详细：光绪十七年(1891年)，重庆城区人口共109163人，公烟馆有838家，私烟馆则大大超过此数。1892年重庆城乡的鸦片铺子有928个，供应烟客人数为20多万[9](175页)。

清末西南地区鸦片如此泛滥，原因何在呢？

其一，清政府禁烟不力，进而借烟增收，致酿大患。

鸦片战争前，清廷是严禁鸦片的输入与种植的。1842—1859年，清廷改为“内禁外不禁”的政策，即对内禁种、禁吸；但对国外输入却不明文禁止，禁限大弛。1859年，为了筹集镇压太平军的经费，惠亲王绵愉奏请洋药、土药一并抽厘，立即得到批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合法化，外来鸦片输入剧增。从1870年至1890年的20年间，大致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在9万担以上，相当于鸦片战争前的3倍。清廷对于是否禁止国内种植罌粟，一度犹豫不决，虽然在1865年下令禁种，次年又颁布了禁种章程，实际上统治集团内部意见很不一致。醇亲王就认为：如果洋药来源不断绝，那么就没有必要禁止土产鸦片种植。后来总理衙门主张以国内罌粟种植来抵制外来鸦片，减少白银外流。在洋烟绝难断源的前提下，后一种主张即以内制外的主张，逐渐占了上风，就连郑观应等人也持类似的看法，认为土药日多，洋药日少，英国人将不得不与中国会商禁烟[17](402页)。可见，从禁到宽，再到增收或以内制外的鸦片政策，是烟毒泛滥的主要根源。

其二，西南地区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有利于

鸦片种植。云南省大部分地处亚热带,气候、土壤都极适宜种植鸦片,所产鸦片质量好,故“云土”被尊为烟中的“上土”。贵州的兴义、安顺地区,与云南邻近,自然条件近似,所产鸦片质量也较好,被誉为“上烟”。四川的气候和土壤也宜于罂粟种植,尤其是东部丘陵地区,很多地方不宜种植水稻,也就为广种罂粟提供了条件。情况相反的成都平原,种植鸦片就较少。这正如英人里希霍芬在《四川记》中所析:“农业条件愈佳和土壤愈沃,则种植罂粟的比例愈小。”[9](174页)

其三,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种植罂粟经济效益特好。据《重庆海关 1876—1891 年》记载:“四川地区的农民种一担地的小麦,利润是 6000 文,而种鸦片一担地利润是 11000 文,小麦和鸦片两者利润之差高达 80% 以上。”[9](49 页)对于一般农民来说,这不能不是一个很大的诱饵。此后,鸦片价格还不断上涨。1897 年前后,贵州、四川不少地方,每亩地如种罂粟,约收烟土 50—60 两,可售银 6—8 两;如种玉米,约收 220 斤,仅收银一两七八钱;如种黄豆、红豆,收入更低[18](628 页),比价高低差数倍。到 1892—1901 年,重庆市场上四川鸦片的价格,由每担 160 两白银涨至 256.5 两;云南鸦片的价格由每担 170 两白银涨至 289.8 两[9](48 页),鸦片价格继续直线上扬。鸦片是价高形小的贵重商品,农民种之胜于五谷,携带和贩运又较为方便,且获利极大。产销两利相促,也就风火添威,欲禁难成了。在当政者禁弛不一,进而借此增收添收,以缓财政拮据的情况下,上下左右共同参与鸦片种植的分赃得利,也就不足为奇了。欲毒不泛,其可得乎?

## 二 鸦片泛滥对清末西南社会的影响

清末西南鸦片流毒之深是前所未有的。

### 1. 造成五谷匮乏,灾荒不断

由于广种罂粟,云南粮食产量大减。1907 年,米价涨至每担 8 两银子。除天旱外,其原因就是种烟占去种粮食的耕地和劳力。对此,《云南》杂志认为该省米薪珠贵的原因,在于“鸦片繁殖,减少农地”[19](64 页)。

在贵州,据 1906 年的统计,种植罂粟之地占清末贵州耕地的 57.34%,居全国之首。例如,该省的安顺地区,19 世纪 80 年代前,“以有用之地

土置杂粮于不种,大半栽种罂粟,相习成风,明目张胆,愈种愈多,几无正粮之地”,以后又扩展到种谷之田。普遍种烟,致使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20](卷四十五,29 页)。由于广泛废粮种烟,贵州出现了几次全省性的大灾荒。该省 1877 年、1879 年和 1895 年出现的三次大灾荒,皆“祸由鸦片”。由于粮价成倍上涨,致使“弱者坐亡,强者入匪”[8](卷四十,33 页),造成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

在四川,因鸦片在川东、川南种植极为普遍,缺粮灾荒现象也再再出现。如涪州,“所产粮食昔可运行湖北,自罂粟遍种,米不足用,反仰给于泸(今泸州)、合(今合川)”[10](卷十八《食货志·输入品》)。光绪中期,因无处不种罂粟,“自楚入蜀,沿江市集卖鸦片者,十室中不啻六七”;加上蜀中不少“山林确瘠之区,不植五谷者,向资罂粟为生计”[21](15 页),以致粮日蹙而价日高。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四川“谷价日昂”,到处“人心惶惑”。推源其故,“实由稻田日少,烟田日多,盖蠹民妨谷,鸦片为甚也”[22]。“多一亩种罂粟之田,即减一亩稻麦之产”,无异于“弃膏腴而滋鸩毒”[23](卷三十四,13 页)。时人已大声疾呼厉禁鸦片,“若听其自然而不加以厉禁,即使无外侮之至,推其终极,亦相率为饿殍而已矣”[24](卷三十四《户政·续禁鸦片说》)。

### 2. 财政方面,饮鸩止渴,赖一废百

西南地区广植罂粟,除部分供本地区消费外,大量外销,并在外运商品中占很大比重。1891—1899 年重庆海关鸦片销运量及比重如文末附表[9](182—183、201、230—231、248、266、287—288 页)。8 年中,仅通过重庆海关一处,外销鸦片量从 7 万多磅猛增至 10 万磅以上,比率从 4% 上升到 30% 至 40%。当政者从禁到弛再到“倡”,目的是增加财政收入,以资外赔内用。从表面上看,这种政策也收到了一时效果。1892 年,重庆海关的税收“有半数来自土产鸦片”[9](175 页),1902—1911 年的 10 年间,烟土税的收入占重庆关税收入的 33%[9](174 页)。鸦片税收“足以使本省(指四川)向来所收一切捐税黯然失色”[9](337 页)。在 1892 年前后,贵州省税收内“土药厘金约有十分之四”[8](卷四十一《前事志》,9—10 页),比例也不可谓不大。

但这些并未能解决当时西南三省的财政危机。因为鸦片这种特殊商品的大量外运,不仅对南方各省人民毒害深,而且从产业和税收上看,它还导致了谷物、豆类等其他农产品的产销陡减,导致民族工业得不到正常发展。1898年英国驻重庆领事列敦在给英国外交部的报告中就说,由于鸦片的滥种和推销,“使得种植豆类和谷物出口无利可图,使得贵重的煤铁矿藏不能开采”[9](45页),不仅造成财政收入的减少,还使物价飞涨,群众生活愈加贫困。

### 3. 毒害人民身心健康,败坏社会风气

众所周知,吸食鸦片不仅严重损害人的身体,还严重腐蚀人的意志和精神,甚至会影响几代人的健康。大量吸食成癮者莫不形骸枯瘦,意志颓丧,百事不举,终日混迹于烟榻床第之间,不少人败家丧身,或沦为扒手、乞丐、土匪。《贵州通志》记载:许多吸烟之人,“形骸瘦弱似枯麻”,致使“农夫化为癮民,……不数年间,上农为下农,下农为惰农”,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民众“男困于鸦片,女困于缠足,四民无一可存之业,必沦黄种于红毛土蕃不已”[8](卷四十,33—35页)。

鸦片的泛滥,造成社会秩序更加混乱。鸦片战争后,西南地区由于外国商品的输入和洋教传入,自然经济逐渐走向凋敝,教民矛盾突出,加之腐朽的清王朝苛政虐民,社会本已动荡不安。鸦片的泛滥和为害,更加重了社会混乱。一些土豪劣绅、袍哥大爷因吸毒成癮而家道衰败,他们同地痞、土匪合流,四处打家劫舍,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在少数民族地区,普遍以烟土换枪弹,民族械斗频繁升级,导致生产荒废,人口锐减。

### 三 清末西南禁烟及其影响

在鸦片战争之后,对于是否禁烟,清政府存在明显的矛盾之处。既想禁绝洋药洋烟,又怕开启外衅;既想用土药来抵制洋药,并借此抽收更多税厘,弥补财政不足,又觉于国于民有害。在这种情势下,清政府出台了“严禁不贷”、“寓禁于征”和“以土抗洋”等矛盾多变的各式鸦片政策,这不仅未能禁绝烟毒,反而使鸦片愈加泛滥。

在光绪初年,清政府下令禁烟。这次禁烟除在西北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外,西南各省基本上未取得什么成效。1906年9月,清政府又下令禁

烟,表示要以十年为限,革除洋土药之害[25](卷二十四,81页)。

清廷在这个时候颁布这样的“禁烟谕令”,实缘于当时国际国内禁烟舆论压力。当时,国际上,美国政府主张禁止鸦片贸易,英国政府的鸦片政策在国内也引起了激烈争论,最后主张逐渐放弃臭名昭著的鸦片贸易一派占了上风。传教士认为鸦片贸易与教义相违背,也力主禁烟。1890年,外国传教士在上海集会,一致认为鸦片贸易是人类一种罪恶,是传播西方宗教的一种障碍,主张杜绝鸦片贸易,随后还成立了中国禁烟会[1](119页)。1906年5月,在禁烟请愿书上签名的传教士就多达1333人[12],表明在华传教士对于鸦片贸易是坚决反对的。中国知识分子和一些官吏也主张禁烟。他们认为:“凡吸烟之人不耐劳苦,筋力减也;不能振作,精神颓也;不思久远,心术坏也。”[24](卷二十四,451页)四川华阳举人严大经、简州举人刘象清、松藩教职李绍南等人,协同各属职员文生,向当时的川东道呈递“禁栽洋药,以平米价”的请愿书[26]。尽管清政府欲禁甚难,甚至从财政收入上看还觉有失,但在禁烟呼声日高的情况下,清政府也就不得不再令禁止了。

清末西南地区禁烟取得了一定成效。

1906年以前,四川的各级官吏虽也多次发布命令禁烟,但几乎都是走走形式。直到1906年清政府发布“禁烟谕旨”,四川禁烟才认真起来。1907年,四川开始登记烟民人数和规定烟馆必须领取执照。1908年,四川总督赵尔巽决定缩短禁烟期限,要求禁烟任务在两年内完成。他首先命令原来种烟的地亩只许种半数,后又下令完全禁种罂粟。1910年初,他派出4个道台和48个委员下乡察看。这样,“人们得知政府认真起来了,很少有人企图继续种植,并且除了一二处曾派去军队铲烟外,大都无须强迫就服从了”[9](273页)。到1911年,重庆海关已没有报关外运的鸦片;川东、川东南地区鸦片生产基本禁绝;川西、川西北的鸦片虽未禁绝,但已转向更偏僻的少数民族山区栽种,仅剩些“产烟秘窟”[27](91页)。

在云南,清末也大力推行禁烟,提倡种棉花、植桑蚕[28]。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云贵总督通知川省厘金总局,从1909年起川省不得再将川

土贩运入滇,因滇省在本年禁绝罂粟,同时又通知贵州抚部院,一概不准运烟土入滇[29]。

到1909年秋天,四川省最大程度地清除罂粟的目的基本达到。40多个中心市场上报,罂粟种植已经停止,前一年许多公路两旁一望数千亩的罂粟地,“现在连一株罂粟也见不到了”[9](296页)。西南三省的鸦片产量也因此陡降。1906年西南三省产烟量占全国584800担的62.24%,到了宣统二年(1910年)全国产烟158505担,西南三省的四川54299担,云南7351担,贵州12241担,三省共占全国产烟总量的46.62%,只及1910年的20.27%。这些数字虽不准确,但至少说明西南三省的禁烟是有成绩的,无论是总量或在全国所占比重都下降了。

清末西南三省禁烟何以能取得如此好的成绩?

首先,统治者重视,并有有利的国际、国内环境。清末禁烟不同于光绪初年,清政府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政权,极力推行“新政”,禁烟被列为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故而不惜牺牲巨额财政收入,多次降旨严饬坚禁,并令在任高官带头限期戒吸。国际上,1909年2月由美国发起的“上海万国禁烟大会”,肯定了中国禁烟的诚意,支持中国禁烟。在这样有利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西南三省的官吏也就认真起来。如1908年四川总督赵尔巽,就下令缩短禁烟期限,两年做到禁绝,并严申如有违法种植的,“地主和农民一并治罪”[30](卷五十五《征榷二十七》)。

其次,西南地区的各级官吏、士绅和知识分子对禁烟热心努力。各地官吏纷纷献策,除弊兴利。云贵总督沈秉堃开滇省矿产,四川总督赵尔巽拟抽肉厘,以弥补禁烟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各级地方官吏也行动起来,在省城设立戒烟总会,在各地设戒烟分会、支会。如万县的汪大令“在城内湖广馆及五显庙设立戒烟公所,分派绅董数人每月定期集合大开演说,所论弊害辞旨极透,闻感动戒烟者,日来已络绎不绝”[31]。巡警道也多次出示晓谕禁烟,四川巡警道就在1910年初贴出极为通俗易懂的“禁烟白话告示”,便于一般百姓了解禁烟的道理[32]。一些地方士绅也努力禁烟。如南部县士绅“竟能多设(戒烟)支会,劝人禁戒,俾痼

疾渐就扫除”[33](7页)。更有郭姓士绅,“劝富户酌减岁租,以纾农力”。该绅“关怀公益,不沾小利”的精神和作法,受到当政者称赞[34](2页)。三台官绅,筹捐巨款在“该县创办一戒烟局,选制良药售送,……近月以来发行药三千两,购领脱瘾者,略经调查已及三百余人”[35]。彰邑牟大令也“设立协济戒烟公所,购药发售,只取工资,并定期派人分赴四乡演说吸烟弊害,戒烟利益,日来感动戒烟者,闻已实繁有徒”[36]。为了达到禁吸的目的,各地还研制了一些戒烟药方。四川省研制出“松毛戒烟膏方,价廉易办收效最多”[37]。后来仁寿县又试验成功一种“戒烟绿豆酒”,其效果也甚佳[38]。

清末西南禁烟也有明显死角,特别在云南边区、贵州少数地区仍有种烟、吸烟的,四川的川西、川西北少数民族山区也是这样。1911年底,因汉区鸦片禁令日严,汉人烟贩就到凉山布吉洛(中普雄)一带租地种烟[39](15、18页)。

鸦片在清末既成为西南地区的主要产销品,它的禁绝必然对西南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正如重庆海关税务司斯泰老(E. Von. Strauch)所述:“如此重要的出产一旦消灭,必然有种种深远影响,首先威胁到四川全省的财务平衡,对种烟的农民、烟贩、官吏和一般民众都有广泛影响。”[9](151页)为此,西南地区除推行清廷的增加印花税和盐厘加价政策外,还采取了种种措施来弥补损失。官方和商人们联合起来,改进丝织品的质量和增加出口的数量;引进外国省民生用多销广之粮、棉、蚕等优良品种,详加试验,“择其宜者,布之民间,庶能广植佳种抵补损失”[34]。劝业道从南通引进的棉种,还无偿发给农民种植。

由于厉行禁烟,产烟下降,输出自然就减少。1909年重庆海关所收税银总数为585641海关两,1910年下降为537344海关两,减少近10%。其中1910年土药出口税减少113761海关两[9](151页),1911年只征税378889海关两,土药税从1910年的148364海关两下降到12695海关两[9](320页)。为了弥补这一巨大损失,西南地区农村将以前栽种罂粟的大片土地改种小麦、玉米、大麦、豆类和花生,这些农产品的产量和出口也大大增加。重庆关小麦出口1909年为927担,1910

年增加到 8303 担,1911 年又猛增至 148949 担 [9](327 页)。豌豆出口量从 1909 年的 4805 担,增加到 1910 年 20499 担 [9](329 页),增加 4 倍多。宣统元年(1909 年),四川总督奏准酌加肉厘拨抵土药税厘,“将以前每猪一只收钱二百文,提高到每猪收四百文”[30](卷四十八《征榷二十考八〇二九》),单项收入也成倍增长。此外,四川督宪还

在同年将当税凑拨办公费用以抵补土药税,即将“当税凑拨尚有盈余,即全数拨作抵‘补川省土药税之用’[34],以弥补烟税损失。

这些措施的推行,对西南地区农业经济的正常发展,对以前的畸形经济状况的改变,对社会不良风气的扭转,以及对正常税源的培养等,都有相当积极的作用。

附表:1891—1899 年重庆海关鸦片销量及比重

年代	重庆关出口上产鸦片数量(磅)	重庆关出口上产鸦片价值(英磅)	重庆关主要出口货物总计价值(英磅)	重庆关土产鸦片占出口货物价值百分比(%)
1891 年	73420	20804	498314	约 4%
1892 年	344310,其中云土 12266	89853	654574	约 13.7%
1893 年	346466,其中云土 11333	106188	733447	约 14.5%
1894 年	302533,其中云土 98533	263785	832948	约 31.3%
1895 年	1570533,其中云土 131733	478410	1066124	约 44.9%
1896 年	1074934,其中云土 138267	275662	870533	约 31.67%
1897 年	1424799,其中云土 172533	381246	1069017	约 35.7%
1898 年	1004000,其中云土 194000	317279	858631	约 36.9%

#### 参考文献:

- [1]于恩德.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M].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
- [2]苗族简史简志全编(初稿)[M].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藏.
- [3]王先谦.东华续录(光绪朝)[M].光绪十四年会稽籀三仓室刻本.
- [4]四川省档案馆:巴县档案:清 6 全宗 6—3,道光:77 卷,内政,片盘号:1.
- [5]况洗林,杨丽琼.近代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鸦片毒害问题[J].近代史研究,1986,(4):133.
- [6]清(宣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1962.
- [7]桐梓县志[M].民国 18 年(1929 年)铅印本.
- [8]贵州通志[M].民国 37 年(1948 年)铅印本.
- [9]周勇,刘景修.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
- [10]民国涪陵县续修涪州志[M].民国 17 年(1928 年)铅印本.
- [11]益闻录,第 145 号.光绪八年(1882 年)二月十四日.
- [12]王宏斌.清末新政时期的禁烟运动[J].历史研究,1990,(4):39-41
- [13]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第五辑[M].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 [14]民国三台县志[M].民国 31 年(1942 年)铅印本.
- [15]各省禁烟成绩调查记[J].广益从报,第 248 号.宣统二年(1910 年)九月二十八日.
- [16]四川省档案馆:巴县档案:清 6 全宗 6—6,光绪:927 卷,内政,片盘号:11.
- [17]郑观应集: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 [18]黔蜀种鸦片法[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十一月][A].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M].北京:三联书店,1957.

- [19]南昆仑生. 云南凶旱之原因[J]. 云南, 1907, 第 5 号.
- [20]安顺府志[M]. 清光绪十七年(1891 年)补刻本.
- [21]入蜀纪程[A]. 何嗣昆. 存梅斋文稿[M]. 光绪十九年(1893 年)版.
- [22]里希霍芬. 四川记[J]. 农学报, 第 35 期, 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五月中.
- [23]求自强斋主人. 皇朝经济文编[M]. 台北: 文海出版社.
- [24]续禁鸦片说[A]. 何良栋. 皇朝经世文四编: 卷三十四户政[M]. 台北: 台湾文海出版社.
- [25]去毒[A]. 皇朝经世文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 [26]四川省档案馆: 巴县档案: 清 6 全宗: 6—5, 同治: 102 卷, 内政, 片盘号: 2.
- [27]四川松理懋茂汶屯区屯政纪要[M]. 民国 25 年(1936 年)版.
- [28]云南档案史料, 1991, (4): 33-62.
- [29]四川省档案馆: 巴县档案: 清 6 全宗: 6—6, 光绪: 757 卷, 内政, 片盘号: 10.
- [30]清朝续文献通考[M]. 宁波: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
- [31]新闻[J]. 四川官报, 1907, 第 6 册.
- [32]演说[J]. 四川官报, 1910, 第 4 册.
- [33]公牍[J]. 四川官报, 1910, 第 1 册.
- [34]公牍[J]. 四川官报, 1909, 第 21 册.
- [35]本省近事[J]. 四川官报, 1907, 第 17 册.
- [36]本省近事[J]. 四川官报, 1907, 第 18 册.
- [37]四川省档案馆: 巴县档案: 清 6 全宗: 6—7, 宣统: 219 卷, 内政, 片盘号: 3.
- [38]公牍[J]. 四川官报, 1909, 第 1 册.
- [39]四川凉山彝族社会历史调查[R]. 成都: 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 1985.

## Opium and Southwest China's Society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LI Hong

(Trade & Economy Department, Caotang Campu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71, China)

**Abstract:** Opium does tremendous harm to modern China, especially to its Yunnan, Guizhou and Sichuan, where opium planting is the earliest and most extensive, opium production is the highest and opium rampancy is most serious. The three provinces take measures to prohibit opium and achieve some successes when in 1906 the Qing government proclaims opium prohibition.

**Key words:**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opium; southwest China

[责任编辑: 凌兴珍]